

基于文献计量与科研项目分析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Bibliometric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许涛 赵爽 杨凡 赵东琦 王苗*
XU Tao, ZHAO Shuang, YANG Fan, ZHAO Dongqi, WANG Miao*

DOI: 10.12145/20240661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大运河天津段文化遗产与旅游带建设研究”(TJSR22-002)

摘要: 通过分析1992年后发表的大运河相关文献, 以及近10年大运河相关的科研项目, 总结研究趋势、内容、方法与对象。结果表明, 自2018年起研究量显著增长, 并于2021年迎来热潮。研究内容多集中在大运河沿线“城”“河”“人”的演变规律及耦合关系、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及大运河的现代化管理方法等。此外, 针对隋唐时期大运河的研究相对较少, 未来应增强数据完整性, 实现均衡发展。

关键词: 大运河; 文献计量; 科研项目; 文化遗产; 保护与利用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Grand Canal published after 1992, as well a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related to the Grand Canal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trends, contents, methods and obj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tudies since 2018, and a boom in 2021. Research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evolution laws and coupling relationships of “cities” “rivers” and “people” along the Grand Canal,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modern management methods of the Grand Canal. In addition,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on the Grand Canal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in the future, data integrity should be enhanced to achieve balanc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Grand Canal; bibliometrics;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许涛 / 男 / 1987年生 /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 研究方向: 景观遗产保护、景观生态规划

赵爽 / 女 / 1994年生 /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 景观遗产保护

杨凡 / 女 / 2000年生 /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 景观遗产保护

赵东琦 / 男 / 1992年生 / 米兰理工大学建筑、建成环境与工程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 城市历史景观设计方法

王苗 / 女 / 1986年生 /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 研究方向: 景观遗产保护

通信作者邮箱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damiaomiao@tju.edu.cn

0 引言

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末期(公元前5世纪)^[1], 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 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它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2], 紧密地联系了国家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3]。2014年, 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 包括河道遗产27段, 缓冲区面积共约556 km², 分布在31个区域中的相关遗产要素58处^[4]。

大运河是中国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和载体。通过研究大运河, 可以深入了解我国古代的水利技术、航运交通、城市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历史, 并为现代城市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近年来, 随着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重视, 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大运河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研究通过汇总、整理及分析大运河现有研究成果, 了解其研究进展与趋势, 为后续研究方向等提供参考。

1 文献计量分析

1.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基于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 分别以大运河和“The Grand Canal”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并进行人工筛选, 最终得到有效中文文献1 043篇、英文文献137篇。本文采用CiteSpace 6.2.R6软件, 分析大运河相关研究的演化路径。

1.2 时序分析

基于1992年1月至2024年5月期间发表的大运河相关文献, 绘制大运河文献量年度变化趋势图(图1)。可以看到, 自2018年后, 以大运河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量激增, 且于2021年达到顶峰。这一现象不仅归因于2014年大运河被收录于世界遗产名录, 还得益于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所做出的重要指示, 强调了保护、传承与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必要性。

1.3 研究趋势分析

根据时间线对关键词进行划分(图2、图3)。可以发现, 2000年前, 大运河的相关研究集中于对运河的污染治理及历史解析等理论研究, 2000年后,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逐步开展, 可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年—2010年)为理论奠基与初步探索期, 相关研究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了初步调查与评估。第二阶段(2011年—2020年)为深化研究与多元发展期, 开始关注运河与区域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探讨运河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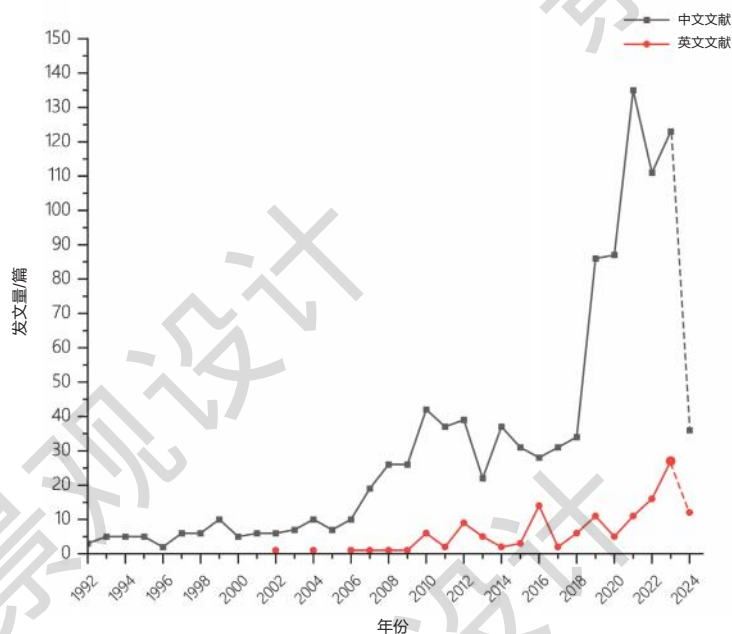


图1 大运河文献量年度变化趋势

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认同、文化传承、城市更新等方面的作用，同时提出了包括遗产保护规划、景观设计、旅游开发等在内的多元化保护策略，旨在实现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和谐发展。第三阶段（2021年至今）为创新拓展与推广期，研究呈现持续深化、多元发展、创新拓展的趋势。

2 科研项目研究进展

筛选2013年—2023年与大运河相关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3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项）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32项），通

过归纳和分析可知，相关科研单位多分布于大运河沿线。此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多，说明学者多从社会科学视角出发对大运河进行研究。

通过分析课题的研究领域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科研项目的关注点略有不同（图4），主要分为文史类、社会经济类、沿线聚落及空间类、可持续发展与保护类。结合相关研究的时间段（图5）和国家政策可发现，2013年—2015年，大运河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大运河遗产管理的探索及历史解析等方面，且研究尺度相对较大。2016年—2017年，课题开始聚焦于小尺度的遗产研究，如探讨洛阳汉唐运河遗址和考古安徽柳孜运河等。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因此，2017年—2019年，大运河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对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探讨，如民间文学、古桥建造、大运河沿线聚落等方面。2020年至今，相关研究多关注遗产保护利用的新策略、新模式，并引入新技术支持大运河活化利用和传播，如数字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

3 主要研究方向

综合相关文献、文献计量分析和相关基金可以发现，近期研究的热点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4类。

3.1 “城”“河”“人”的演变规律及耦合关系

相关研究多从运河的历史演变、社会变迁、聚落时空特征等方面探讨大运河沿线“城”“河”“人”的复杂关系。夏坚勇以“时间”与“空间”双维度交织的叙事框架，全面地梳理了大运河的军事和漕运史^[5]。夏锦文从历史演变角度出发，发现大运河的兴建带动了沿运地区的繁荣发展^[6]。赵亚琛等探讨了鲁运古镇的空间演变规律和驱动因素^[7]。Huo XL等研究了大运河山东段约1.3万乡村聚落的分布、规模和形态特点^[8]。

此外，运河沿线居民因运河荣衰而呈现出独特的演化规律，并形成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及社会经济结构^[9]。易筱雅等探究了浙东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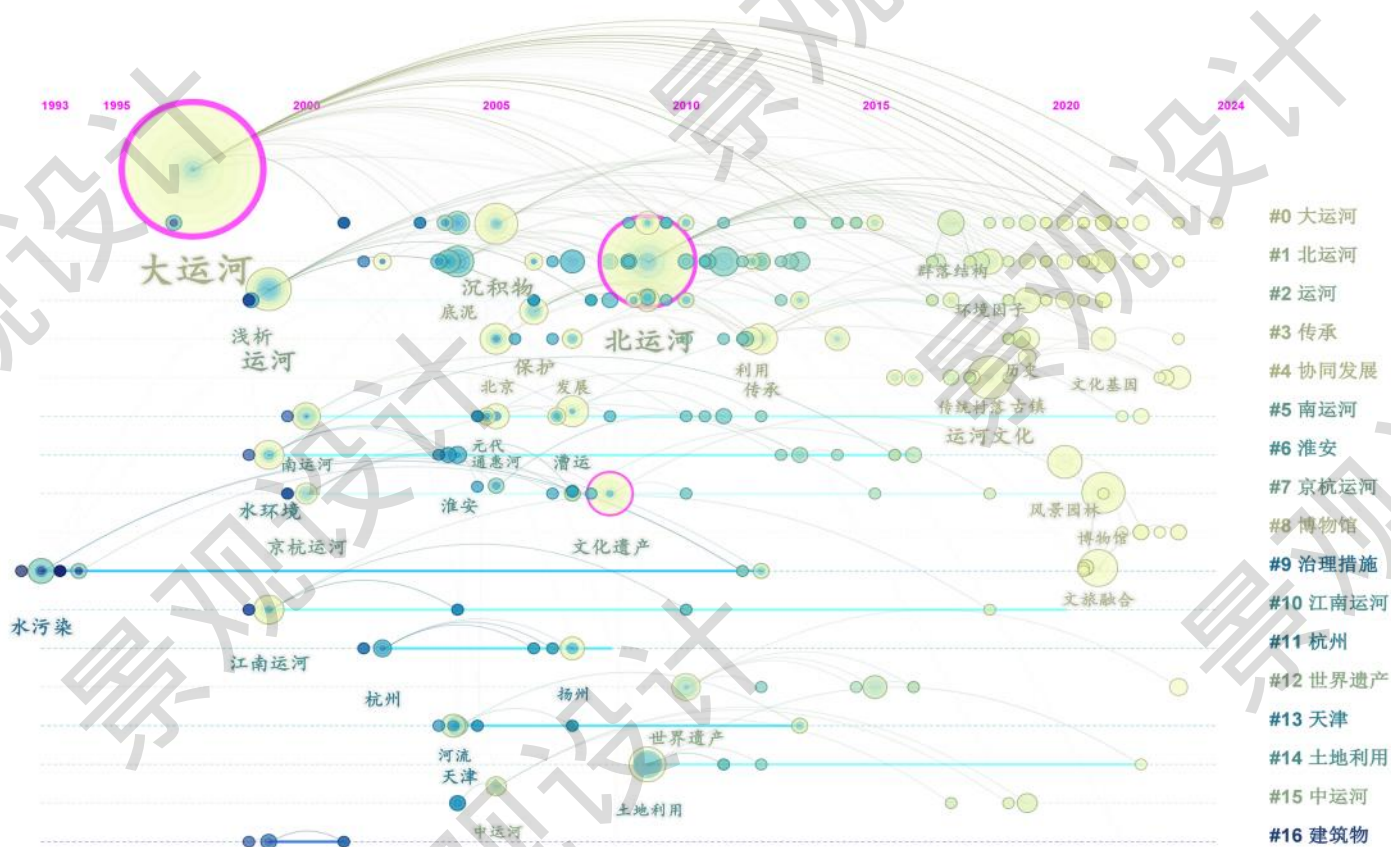


图2 “大运河”关键词时间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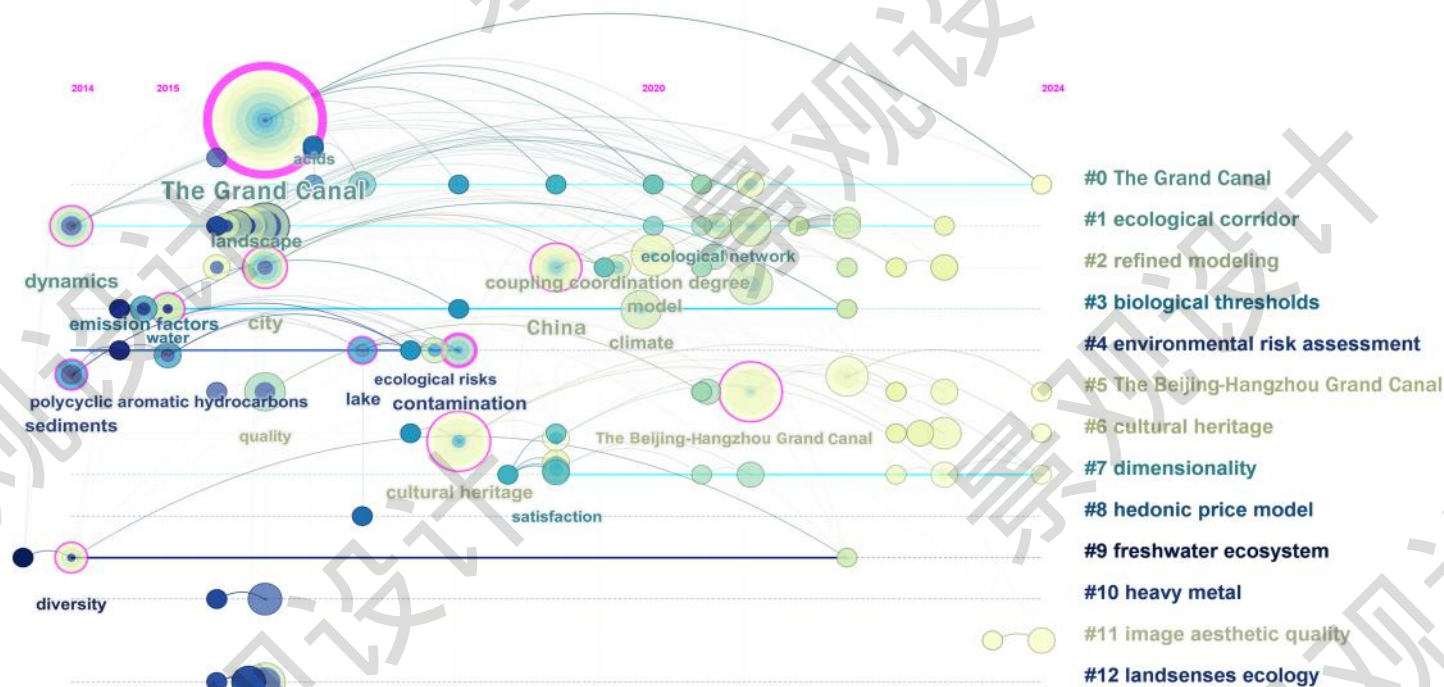


图3 “The Grand Canal”关键词时间线图

河商贸、水利和文化系统间的交织形态^[10]。Zhao Y等提出自然地理环境、粮运工程与管理制度的大运河天津段沿线聚落空间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11]。相关研究从历史和社会学视角出发，以聚落空间为载体，通过研究聚落时空演变特征、运河轨迹变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的变迁等，探究“城”“河”“人”的互动关系。

3.2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相关研究多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文化基因的挖掘与提取等方面探讨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众多物质文化遗产分布于大运河沿线。焦敏归纳并整理了大运河文化带中1 809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俞孔坚等记录了京杭大运河的遗产资源现状^[13]。Qiao F等研究了大运河沿线的淮安、扬州民居^[14]。姜师立从规划设计、水利工程、创新科技等方面介绍了大运河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15]。

此外，大运河孕育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艺术品质^[16]，在传承和保护过程中，

可以提升当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7]。然而随着运河功能的转变和商业化、同质化趋势逐步显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民间艺术形式和文化习俗正在逐步消失。郭新茹等深入剖析了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中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18]。Yang J等研究了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变化及其影响因素^[19]。

对于大运河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部分研究引入“文化基因”理论。霍艳虹等借鉴生物基因逆转录法，对文化遗产中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提取和分类，并提出转嫁、提炼、隔离与保育的传承策略^[20]。这类研究常从环境、建筑、文化、布局等角度出发，通过符号、图形、文本等形式提取文化基因，有助于解决大运河部分历史空间辨识度低、体系化缺失等问题。

3.3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相关研究多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运河沿线文旅融合及生态保护等方面探讨大运河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我国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因辐射范围广、工程量大的问题，面临建设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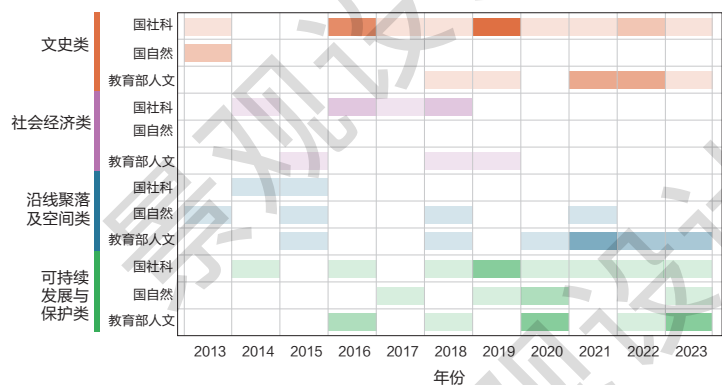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类型科研项目的关注点及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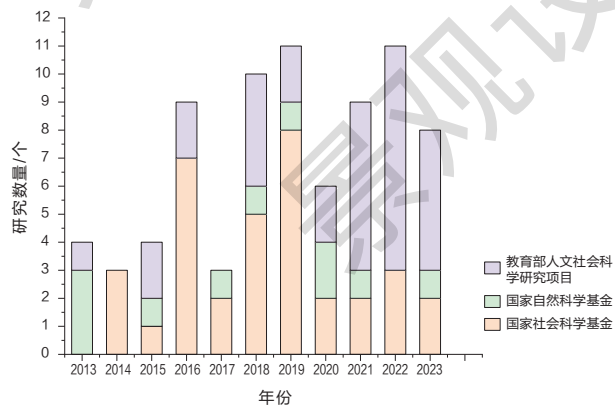


图5 2013年—2023年大运河相关研究数量

大、开发与保护冲突、跨区域统筹难等多重挑战。刘晓峰等认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契合重大区域发展战略^[21]。曹磊等提出基于叙事空间视角，研究大运河叙事空间的历史演变，为国家文化公园空间构建提供依据和支撑^[22]。

如今，运河漕运功能逐渐弱化，大运河的文化与旅游价值持续提升，并逐步形成新型城河共生模式。王秀伟提出如今大运河文化带的文旅融合水平整体偏低，需要进行合理的统筹规划及因地制宜的差异化设计^[23]。Zhang S等结合大运河沿岸22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资源（R）—自然环境（N）—产业经济（I）评价体系，从遗产整体的角度衡量其旅游价值^[24]。

除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价值外，大运河还具有生态美学价值。厉建梅和Zhang Y等研究并评价了大运河旅游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25-26]。陈喜波等提出了构建生态本底廊道，利用生态科技等手段建设生态路径^[27]。

3.4 大运河的现代化管理方法

大运河现代化管理方法综合考虑了生态、文化、旅游等多方面因素，强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多元化管理策略。

(1) 合作与协调机制

相关研究致力于建立健全大运河沿线各职能部门间的合作和协调机制。蒋惠凤等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间合作的形成机制^[28]。大运河沿线城市通过合作和协调机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合理布局，促进区域间的均衡发展。

(2) 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世界遗产在保护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付琳等以英国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和加拿大里多运河为研究对象，总结出2项公众参与管理制度和3项具体参与机制^[29]。社会公众是大运河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承者，只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大运河的文化内涵才能得以传承和弘扬，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才能实现从“水安全”到“水幸福”的转型。

(3) 法律法规完善

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与大运河相关的政策法规（图6），在后续发展中还应该继续加强大运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工作，为大运河的保护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4 研究对象及范围

根据地理位置，大运河在研究过程中常分为10段。通过统计和梳理相关文献可知，学者多关注大尺度区域（全域或京杭大运河段），以及局部江南运河段和北运河段，而针对隋唐时期运河段的研究相对较少（图7），存在各段研究不均衡的问题。

从对运河各段研究的占比和频次变化来看（图8、图9），当前的研究视角从单一段落逐步扩展。2018年后，各段研究数量均呈现显著增长态势，其中以大运河全段为研究对象的发文量增长最为明显，并且占比逐年提升，可见大运河整体保护和区域协同发展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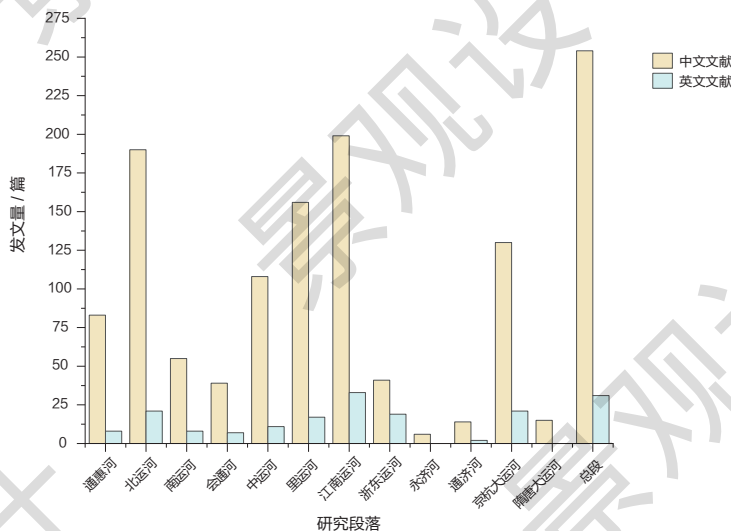


图7 大运河各段研究频次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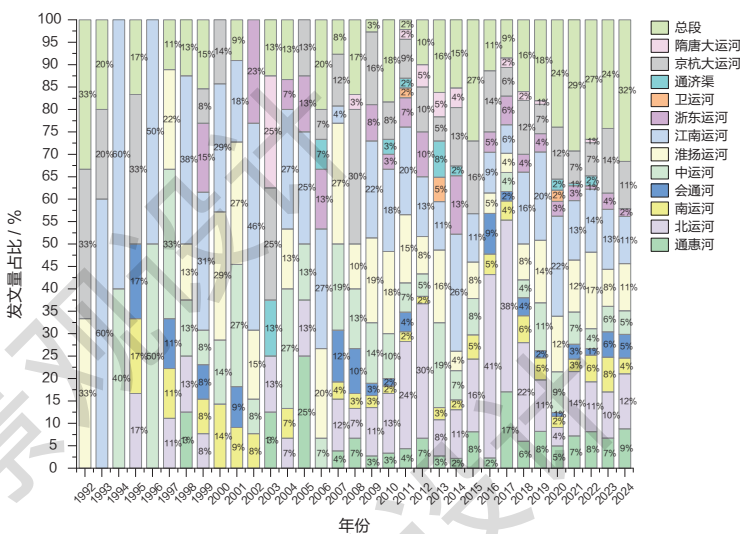


图8 大运河各段研究比例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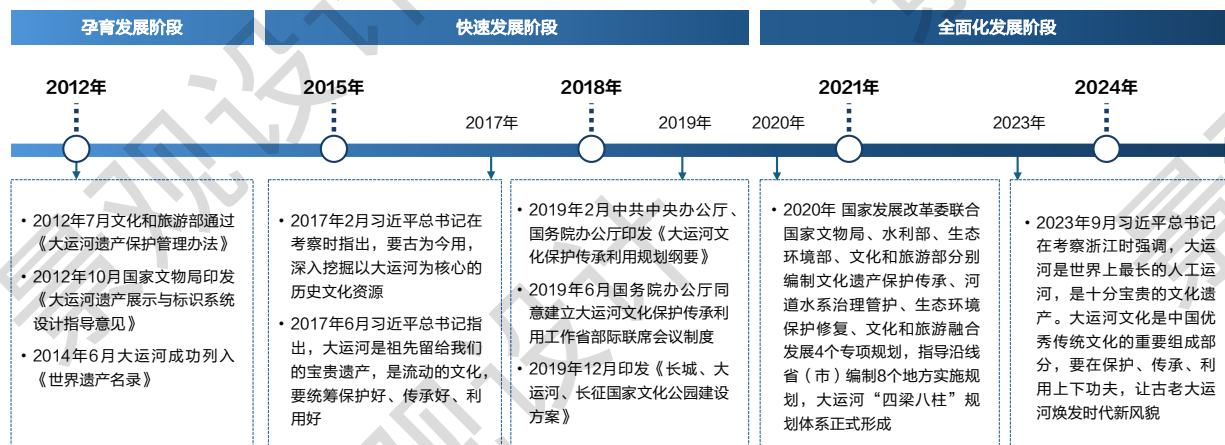


图6 大运河相关政策法规时间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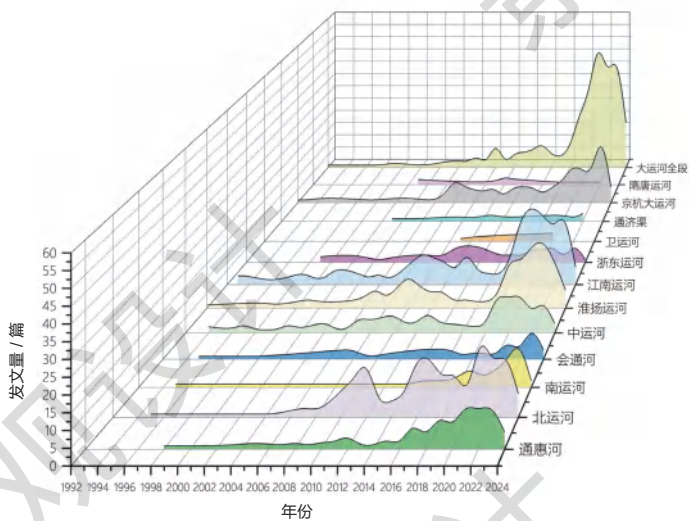


图9 大运河各段研究频次统计

5 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双重机遇下，大运河成为各领域的热点议题。自2018年后，以大运河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量呈现激增态势，并于2021年迎来研究热潮。以2000年为界线，之前研究多聚焦大运河的污染治理及历史解析等理论研究，2000年后，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健全，研究领域聚集文史类、社会经济、沿线聚落及空间和可持续发展与保护等方面。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量最多；2014年—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为主要科研项目类型；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数量骤降，三类基金数量趋同；2021年—202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量显著增加，成为大运河研究的主要科研项目类型。关于大运河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大运河沿线“城”“河”“人”的演变规律及耦合关系、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大运河的现代化管理方法。此外，通过统计和梳理大运河各段的研究频次可知，学者多关注运河全线、江南运河、淮扬运河及北运河段，而针对隋唐时期运河的研究相对较少。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持续关注以下5点：增强数据的完整性，注重多学科融合；平衡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深入挖掘各段运河的价值，实现均衡发展；增强公众参与，拓宽国际视野；权衡技术的工具理性与遗产的文化价值属性。

参考文献:

[1] 李伟, 俞孔坚, 李迪华. 遗产廊道与大运河整体保护的框架[J]. 城市问题, 2004, 23(1): 28-31+54.

[2] 俞孔坚, 李迪华, 李伟. 京杭大运河的完全价值观[J]. 地理科学进展, 2008, 27(2): 1-9.

[3] 单霁翔. “活态遗产”: 大运河保护创新论[J]. 中国名城, 2008, 22(2): 4-6.

[4]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The Grand Canal[EB/OL]. [2020-10-21]. (2024-6-15).

[5] 夏坚勇. 大运河传[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6] 夏锦文. 大运河文化研究[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7] 赵亚琛, 张兵华. 鲁运河沿线古镇空间发展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J]. 地理科学, 2023, 43(9): 1629-1639.

[8] HUO XL, XU XW, TANG Y, et al. A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Settlements along the Shandong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J]. Riv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23, 39(7): 1283-1299.

[9] 吴晓, 王凌瑾, 强欢欢, 等. 大运河(江苏段)古镇的历史演化综论——以江苏历史文化名镇为例[J]. 城市规划, 2019, 43(4): 93-106.

[10] 易筱雅, 何依, 邓巍, 等. 浙东运河“城—运”历史文化空间形态特征及保护启示[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3): 30-37.

[11] ZHAO Y, BIAN GM, SUN TY, et al. The In-Situ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Settlement Space along the Grand Canal Tianjin S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J]. Land, 2023, 12(5): 1023.

[12] 焦敏, 路璐, 牛福长, 等. 大运河文化带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3, 43(3): 228-239.

[13] 俞孔坚, 李迪华, 李海龙, 等. 京杭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4] QIAO F, SHIN CM.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Vernacular Dwellings in the Li Canal Reach of the Grand Canal[J].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 2020, 19(5): 417-433.

[15] 姜师立. 中国大运河科技[M]. 北京: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24.

[16] 佟东, 周佳艳, 潘赛. 京杭大运河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M].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22.

[17] 朱云, 陈梦宇, 杨雨轩.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我国大运河沿线城市传统体育非遗传承路径研究[J]. 文化学刊, 2023, 18(8): 16-19.

[18] 郭新茹, 陈天宇, 唐月民. 场景视域下大运河非遗生活性保护的策略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 5: 161-168.

[19] YANG J, WANG L, WEI S. Spatial Variation and its Loc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ment along the Grand Canal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 20(1): 662.

[20] 霍艳虹, 曹磊, 杨冬冬. 京杭大运河“文化基因”的提取与传承路径理论探析[J]. 建筑与文化, 2017, 14(2): 59-62.

[21] 刘晓峰, 孙静. 协同学视角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互嵌[J]. 东岳论丛, 2022, 43(9): 104-110.

[22] 曹磊, 韩轶群, 李子璇. 叙事空间视角下的天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格局构建[J]. 风景园林, 2023, 30(2): 65-72.

[23] 王秀伟. 大运河文化带文旅融合水平测度与发展态势分析[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37(3): 60-69.

[24] ZHANG S, LIU J, PEI T, et al. Tourism Value Assessment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The Case of the Beijing - Hangzhou Grand Canal in China[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23, 26(1): 47-69.

[25] 厉建梅, 单梦琦, 齐佳.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J]. 经济地理, 2022, 42(10): 201-207.

[26] ZHANG Y, TIAN Q, WU J.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Obstacle Factors between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Basin, China[J].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24, 26(1): 2589-2613.

[27] 陈喜波, 王亚男, 郝志群. 北京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生态路径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22, 29(8): 38-43.

[28] 蒋惠凤, 刘益平. 基于演化博弈的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间合作发展策略研究[J]. 运筹与管理, 2021, 30(10): 175-182.

[29] 付琳, 曹磊, 霍艳虹. 世界遗产运河保护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21 (8): 53-58+65.